

史记新探

俞樟华 著



笔者与作者已有十年的文字交往，我们正在合作《史记研究集成》的大型学术工程，作者用力甚勤，博得参与者同行的好评。《新探》付梓，作者承索序言，笔者喜读《新探》，故而冒昧应承，写了如上文字，未必切合《新探》成绩于万一。最后，我要说的是，宏扬和普及《史记》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要把《史记》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典籍普及开来，使这份珍贵的遗产真正成为广大人民所占有、所享受的艺术品，要做的工作还有许多。例如从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史记》与古代典籍的关系，以及从艺术角度一篇一篇，一人一事解析《史记》，就是两个薄弱环节。《新探》恰好在这两个薄弱环节上登高呼喊，相信必将有后来者群起响应，同时也希望俞樟华同志努力发挥年龄优势，孜孜不倦地继续钻研下去，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人生有涯，学海无涯。既企望于《新探》作者俞樟华同志，笔者亦愿谨以此自勉。

是为序。

张大可

1994年7月6日于北京

《史记新探》序

这部《史记新探》论集(以下简称《新探》),从体例结构到论题内容,都体现了一个“新”字,无疑是我国当代学术界《史记》研究领域绽开的一朵奇葩,值得庆贺的一部新作。尤为可喜的是,作者俞樟华是一位勤勉发愤的青年学者,还未到不惑之年,已在《史记》研究领域耕耘丰收,硕果累累。著作有《史记会注考证驳议》点校、《四史评议》点校、《历代名臣传》点校等;与人合作撰述了《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史记研究史略》、《史记通论》、《司马迁一家言》等书。这些论著已在学术界展示了作者峥嵘的头角。更代表作者特色和功力的是近十年来所发表的数十篇《史记》论文。这部《新探》就是从这数十篇论文中精选出来,按作者构想的思维系统重新组合的一部个人学术专著。这部专著的学术造诣,已经达到了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言的境界,标志着《史记》研究领域一颗新星的升起,怎能不庆贺?

众所周知,一个电子元件,它只显示单一功能,而将若干不同功能型号的电子元件,按照一定系统组装起来,就成为多功能的电脑或其他不同用途的电器,显示出无限神力。这就是集群效应或系统效应的价值。单篇论文,好比是一个电子元件,容易制作。而对一个大课题作深入研究,写出系列论文就不容易了。由系列论文构成的学术著作,恰如由集群电路组装的电器,它将显示无限神力的

系统效应，这效应就是表现作者个性思维的学术体系。《新探》就是这样的一部学术论著。读者自然要问，这部《新探》“新”在什么地方？它“探”了些什么内容？在学术史上有无位置？应占什么地位？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简明地展示一下《史记》一书的价值和研究领域的现状，读者不难从比较中引出应有的结论。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和文学家。他有着崇高的人格，远大的理想，坚强的毅力和卓越的史才与文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质的中国古代通史，即纪传体《史记》，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史学宝典。从文献价值看，《史记》是一部划时代的文献大典，它是概括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中国古代三千年文化的百科全书，博大精深。人们研究西汉以前的古代社会，从事史学、文学、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民族、文化、天文、地理、历法、医学、美学、语言学、伦理学、民俗学等等各个门类的学科研究，无不取资于《史记》。《史记》恰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万古奔流。研习者如同饮河之鼠，各充其腹而已。自《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阅读和研究它，留下的论著论文之多，没有人能够完全统计。仅清代研究《史记》留下文章论著的人就有三百多个。新中国成立四十五年来，研究《史记》的论文有一千六百余篇，作者数百人，出版论著六十余种。台湾学术界与大陆旗鼓相当，四十余年来发表学术论文四百余篇，出版学术论著四十余部，数量比大陆略少，而质量不可低估。海峡两岸，并驾齐驱，各领风骚。日本汉学界，近代以来的《史记》研究名家约一百三十人，出版专著译著六百多种。单篇论文，不可统计。其他有我国东邻韩国，西方美、俄、法、英、德等国家的汉学家，对《史记》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司马迁和《史记》，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史记》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课题，当然中心地区在我们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日本。《史记》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已具有高水准，研究成果，单就新中国的成绩就有几千万字。许多《史记》课题，一代又

一代的人作了数十百次的重复研究,《史记》的各个角落均有人开拓,似乎有“题无剩义”之感。在《史记》研究这块万紫千红的百花园地中,要绽出一枝独秀的鲜花,可以说是很难的。而《新探》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放出异采,实属难能可贵。

《新探》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关合天人古今的结构,自成一家言。司马迁对自己的《史记》作了如下十五字总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既概括了《史记》在史学上的贡献和百科全书的性质,也反映了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和独创性。学术界认可司马迁的自评,并简缩为四个字,叫“天、人、古、今”。意思是说,《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包容了天地人事百科内容,贯通古今自成体系为一家言。《新探》集论十八题,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探讨《史记》的思想与艺术,下篇探讨《史记》的源与流。上篇七题,其中五题探讨思想,两题探讨艺术,均各有一个中心。探讨思想的五题,开卷讲“太史公曰”,其实是开门见山讨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这个开卷题选得极好,它突出了一个“史”字。以下关于法律、民俗、姓氏、地名几个专题,均着眼于从“史”字探索司马迁的立意。我们说司马迁集文史哲于一身,但主流是历史家,司马迁一家言的核心,是独创了一个新史学体系,奠定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地位。《新探》抓准了“史”字立题立言,可谓深得司马迁一家言的精髓。《史记》的文学价值与艺术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如散文艺术、语言艺术、文章风格、传记文学等。《新探》关于艺术的两题,作了点与面的分工。第一题《论史记人物传记》是重点,以传记人物为中心讲《史记》的艺术成就,突出了一个“人”字。《史记》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就是写人艺术。第二题《古代学者对史记的艺术评论》,全面触及《史记》的艺术价值,作了宏观的轮廓概述。这是师法司马迁借他人之语以立论的手法,既总括了前人的成就,又达到了立新意的目的,可以说是一石两鸟。上篇七题的总体布局,由点切入,专论“太史公曰”,由面化出,宏观评

点《史记》的艺术轮廓,配合精妙。下篇十一题,前四题探讨“源”,后七题探讨“流”,至为明显。在探讨“流”的七题中,前三题为史学之“流”,后四题为文学之“流”,层次井然。《新探》十八题的布局与结构内容,可简缩为“史、人、源、流”四字,实即关合司马迁“天、人、古、今”四字,表现了论集似散而有中心的学术体系,紧扣研究对象,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言。我们可以断言,《新探》问世后,将立于学术之林,作者的这一精意构思和选题,起了奠基的作用。

其二,求新求实的立言内容,填补了某些学术空白。求新有多种形式。有的故作标新,转换名词,或故作偏颇之论,华而不实,此等求新,应予摒弃。如果用新方法、新视角、新材料翻出新意,或挖掘新课题,此为求实基础上的求新,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求新,应予鼓励。只有求新,学术才能前进。《新探》论集就是在求实基础上的求新,所以获得了许多创见,值得肯定。《新探》的求新,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开掘新课题,第二是以细密的材料为主与新方法结合翻出新意。试简析之如下。

《新探》十八题,有十二题基本为新开掘的论题。其中探索思想的有四题:《司马迁的法律思想》、《司马迁的民俗观》、《司马迁与古代姓氏学》、《司马迁与地名学》;探索艺术的有一题:《古代学者对史记艺术的评论》;论“源”的有一题:《史记与晏子春秋》;论“流”的有五题:《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史记与戴名世》、《史记与三苏》、《史记与三国演义》、《史记与水浒传》、《史记与戏曲》。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只言片语论及的也有,也有个别的专篇文章,但象《新探》这样作集中和系统的论述还是首次。这些论题内容填补了这些方面的学术空白。其中,《史记》与《晏子春秋》、《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与欧阳修、戴名世、三苏等题最引人注目,不仅课题新,而且论述内容平实而有力,表明作者进行了深入的钻研。以《史记》与《晏子春秋》为例,作者通过两书的比勘对照,认为“《史记》以写人为主的体裁和《晏子春秋》专记晏子一人事迹的体裁比较一

致”。例如以事迹为中心记叙人物，用小故事刻画人物形象，有头有尾的故事情节，富有个性特点的人物对话，中心人物与次要人物的交错叙述，人物末尾的“君子曰”评论，都表明了《史记》与《晏子春秋》之间有承传关系，“因此，《晏子春秋》对司马迁创立传记文学的影响，不可低估”。这个结论从具体事实的比较中得出，令人信服。又如作者对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与《史记》之间的承袭关系的分析，也很有创见，所以文章发表后，立即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复印，《新华文摘》也作了转摘。

《新探》对传统课题作了新探索，共有六题，只占全书三分之一。这六题中，探索思想的有一题：《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探索艺术的有一题：《论史记人物传记》；探索“源”的有三题：《史记与左传》、《司马迁与先秦诸子》、《司马迁与诗人屈原》；探索“流”的有一题：《史记》与《汉书》。这些课题是研究《史记》的人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每个研究者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回答好坏，智愚立见。不少人是在现有研究成果中翻筋斗，炒冷饭，自然谈不到新意。《新探》总能拿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以论“太史公曰”为例。作者用条列分类的方法，概括了“太史公曰”有七个方面的内容：（一）阐明立篇旨意；（二）论史料的选择和运用的态度；（三）引据事实辟去相传的谬说；（四）叙述实际调查行踪和收获；（五）谈个人成败得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六）论统治阶级为政的得失；（七）自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经过及撰著《史记》的动机、意旨和感想。条列分类是一般的方法，对探索问题的深度有局限，但它对于复杂内容的条析和理论升华，是切实而有效的。“太史公曰”是司马迁最直接的史学理论体系，内容丰博而复杂，《新探》首次作这样的条析，还是很不容易的。《新探》还对“太史公曰”形成的历史渊源、表现手法、前人的论评作了总结，提出许多独到而有价值的见解。《新探》认为，“太史公曰”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富有创造性”，它是“在一幅绚丽多彩画面

上的精采一笔,非但没有破坏文章艺术上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而且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性”。最后结论是:“无论从史从文说,司马迁的论赞都是《史记》正文的补充,是充满光彩的‘豹尾’,也是《史记》这部完整的艺术品的锦上添花之笔。”这是针对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抨击《史记》论赞为画蛇添足的误说而发,很有见地。

从上分析,《新探》作者在自己所立论的“史、人、源、流”四个方面,既有对传统课题的翻新,主流则是开掘新课题,顽强地显示作者个性化的独创,这是一种攀登险峰的精神,值得肯定。从事学术研究,而欲立于学术之林,没有这种精神,是不可能的。

其三,宏观立论基础上的索隐发微,开拓了《史记》研究新领域。对具体问题作细微的分析论证,称为微观研究,例如对《史记》具体的篇章、人物、事件进行考察分析,就是微观研究。至于考订史实,校勘文字,疏解词句、掌故,更是微观研究。考察《史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贯通古今,把握全局和总体,就是宏观研究。两者相辅相承。传统的《史记》研究,侧重于史实考订、文字校勘训诂、名物制度及地名等的疏解,其研究方法是罗列材料,引证甲说乙云,层层相因,缺少新意,停留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裹足不前。缺乏宏观指导的微观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会有大的出息。但微观研究是宏观立论的基石,没有微观研究的功力,宏观立论未免流于空论。《新探》作者,将二者统一起来,相辅为用,获得了显著的成绩。《新探》所论十八题,作者以宏观布局,微观分析的研究方法至为明晰。上篇探索《史记》思想艺术,下篇探索《史记》的源与流,明显地反映了作者贯通的精神,把《史记》放在整个汉文化、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分析和评价。探索《史记》的“源”,实际是评述《史记》对先秦文化的承传与总结;探索《史记》的“流”,实际是考察《史记》对汉文化的影响。而单篇论文的具体论证,《新探》又基本是运用微观的方法,进行详实的考察,言必有据,

论从史出。例如作者概述古代学者对《史记》艺术的评论,指出司马迁的文才和《史记》的文学价值,是在汉魏到明末这一漫长时间里逐渐被认识,至清才达于深化。唐代古文大家韩愈评论《史记》文章“雄深雅健”,柳宗元评之为“峻洁”,影响至为深远。何谓“雄深雅健”?作者认为“主要是指《史记》语言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说的。”然后引证宋明学者的具体分析展开评说。宋洪迈举《魏世家》魏公子无忌与魏王论韩事说:“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十余语之间五用“魏”字等例,说明《史记》文字的流转和重复取势。又引明方孝儒的评论说,《史记》之文“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云,澄之如太空,攢之如绮縠,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明代归有光评点《史记》,更多的是谈文章的转折波澜,起伏照应,但并未抉发出《史记》文章的精髓。有清一代,经过桐城派古文大家方苞、刘大櫆、林纾,以及《史记》评点家吴见思等人的发掘才将《史记》文章的精妙及风格气势淋漓尽致地阐发出来。作者放眼《史记》流传两千年的发展脉络,从分散而杂乱的历代文集资料中披沙拣金,把握重点,从而展示了各个时代不同的研究状况和特点,用力之勤,可以想见。作者的这一研究,开了一个新生面,即对《史记》的流传及影响作系统的总结,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古今中外《史记》研究全貌的信息和借鉴,是非常有意义的。

《新探》作者的微观研究,摒弃传统的资料排列方法,不是机械地引证甲说乙云,而是运用比较方法,综核材料,这是较为科学的方法,与宏观立论相吻合。例如马班异同,这是一个传统的比较课题。《新探》作者跳出甲班乙马或甲马乙班简单优劣论的圈子,全面比照,综合归纳《史》《汉》两书资料,提出“体例异同”、“思想异同”、“风格异同”的对照范围,不是简单的文字对照,立论起点就高。作者认为,总体上,《史》优于《汉》,尤其是思想识见,司马迁高于班

固,这是由时代和立场所决定的;文章风格,《史》《汉》各有特点,司马迁和班固风格不同,都是大手笔;史学体例,《史》《汉》两书有五十多篇相同篇目,班固取资《史记》,但“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在继承中有补充、有调整、有发展”,有些传记,“班固补充了一些新材料、新史实,极大地丰富了记事内容”。班史十志,“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范围,也增补了《史记》的不足。”这些见解是新颖的,不仅公允,而且平实,研究方法和态度,都应肯定。

综览《新探》,十八个论题中有十三个论题皆为司马迁与什么,或《史记》与什么,明显标示比较的意味。中国传统的比较研究,司马迁第一个运用,《史记》中的合传、类传,就是用纵横比较方法归类人物。传统的比较研究而成一门学问,只有“马班异同”,成为史记学的一个分支。诗人李杜、散文韩柳、帝王秦皇汉武、将军卫霍,这类并提的事例很多,但未形成全面的比较学。因此,在中国学术界,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并不普遍,更谈不上深入。《新探》的尝试,无疑开风气之先,且初试锋芒就取得成效,可贺可佩!

其四,简洁流畅的语言,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特色。不同的时代,语言文风具有不同的特点,只有为大众所接受才是有生命力的。当代社会生活快节奏,文风要求简洁明快,有透明度。如果学术论文让初中生能看懂,而学术水平让专家学者也不敢轻视,这就是最成功的语言。《新探》论集,讨论的是学术问题,而语言简洁流畅,行云流水似散文,有些段落可以诵读而朗朗上口。例如作者阐述韩愈论《史记》文章雄健,作了如下解说:

文之雄健,全在气势。司马迁行文,如六辔在手,控纵驰骋,运用自如,举凡三代之礼乐,刘项之战争,以及律历天官、文词事业,在他笔下恰似掌上转丸,写来毫无辛劳之态,其文笔雄骏宏肆,文章确实给人以气势磅礴的感觉。

作者论述得多么轻松自如,绘声绘色,使得学术品味,能够雅俗共赏。作者还有意师法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笔法,把论断和

观点融入叙事之中。例如作者论证《史记》传记的体例以及写人手法,受《晏子春秋》的影响很深,有着如下的一段事实叙述,其言说:

《晏子春秋》作为我国文学史上出现最早、最古老的人物传说故事集,在当时和后代都流播很广,受人喜爱。司马迁在写《史记》为晏子作传时说此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说明他是见过《晏子春秋》的。再说,《史记·晏子列传》所载的事迹,以及《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晋世家》、《赵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世家》、《司马穰苴列传》等篇所涉及到的晏子事迹,全都取材于《晏子春秋》。

这段话叙述了三个事实,第一,讲《晏子春秋》流传很广;第二,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明司马迁不仅看过《晏子春秋》,而且很推崇;第三,从《史记》书中找出大量本证,说明《史记》吸收《晏子春秋》的资料。这些事实言外之意,不用剖明而自见。

《新探》作者为了立论通俗、显达,把立篇旨意提炼成为标题,嵌入论文之中,具有章节体式的意味,篇篇如此,形成作者的风格。笔者很欣赏这种雅俗共赏的论文写作方法,面向大众,使具有中等文化知识水平的人都能阅读。我们常说的深入浅出,深入尚可,浅出则不易。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做起来很困难。这是时代的需要,应该朝着这一方面努力。《新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1990年,《新探》作者俞樟华与另一位青年学者张新科合著的《史记研究史略》在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后,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这部论著填补了史记学发展史研究方面的学术空白,使得一位学术长者击节叹赏。这位学术长者就是《史记艺术美研究》一书的作者,吉林师院年逾六旬的宋嗣廉教授。宋文曰:“后生可畏,后生可敬。”文章标题为《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的一部力作》(载《吉林师院学报》1991年第3、4期合刊),肯定作者踏实的求真求是的学风,以及敢于攀登学术高峰的志向。《新探》的出版,可证宋先生知人。

目 录

《史记新探》序	张大可(1)
---------------	--------

上篇 《史记》的思想与艺术

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3)
---------------------	-----

- “太史公曰”的产生和发展(3)∪“太史公曰”的主要内容(8)∪“太史公曰”的表现手法(14)∪明清学者论“太史公曰”(17)

司马迁的法律思想	(28)
----------------	------

- 拥护约法省刑,反对严刑峻法(28)∪以礼治为主,法治为辅(32)∪抨击酷吏,主张任贤施法(33)∪赏善惩恶,公正无私(37)

司马迁的民俗观	(40)
---------------	------

- 礼俗源于社会需要(40)∪强调民俗与政治、经济的关系(41)∪赞同对民俗的改革(43)∪注重少数民族习俗的记载(44)

司马迁与古代姓氏学	(47)
-----------------	------

- 司马迁对古代姓氏的记载(47)∪司马迁是古代姓氏学的早期研究者(51)

司马迁与地名学	(58)
---------------	------

司马迁对古地名的掌握(58)の司马迁对地名学的
贡献(62)

论《史记》人物传记 (68)

《史记》人物传记的特点(68)の《史记》人物传记的
艺术手法(73)の《史记》人物传记的开头和结尾
(83)

古代学者对《史记》艺术的评论 (94)

明代以前的评论(94)の清人的评论(101)の明清
学者论太史公的叙事笔法(107)

下篇 《史记》源流论

《史记》与《左传》 (119)

变编年为纪传(119)の対《左传》史料的吸收和改
造(120)の思想方面的进步(122)の继承文史结
合的传统(123)

司马迁与先秦诸子 (127)

司马迁与儒家(128)の司马迁与道家(131)の司马
迁与法家(133)の司马迁与阴阳家(135)

《史记》与《晏子春秋》 (138)

体例影响(138)の写人艺术的影响(141)

司马迁与诗人屈原 (147)

司马迁对屈原的记载和评价(147)の屈原对司马
迁的影响(150)

《史记》与《汉书》 (155)

体例异同(155)の思想异同(159)の风格异同
(161)

《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164)

叙事祖《史记》，故文辞高简(164)の尤爱司马迁善

传,欲学其作(168)の序论得《史记》之神(171)	
《史记》与戴名世	(175)
共同的修史宏愿(175)の相同的史学观点(179)の	
杰出的史传文学实践(183)	
《史记》与三苏	(187)
三苏评《史记》(187)の三苏读《史记》(191)の三苏	
学《史记》(195)	
《史记》与《三国演义》	(201)
《史记》人事被大量引入小说之中(203)の何其相	
似乃尔的人物(207)の情节故事方面的师承	
(212)	
《史记》与《水浒传》	(218)
情节方面的影响(218)の体例方面的影响(223)の	
写人艺术方面的影响(225)	
《史记》与戏曲	(234)
《史记》中的戏曲资料(234)の戏曲取材的宝库	
(238)の对戏剧创作的影响(241)	
后记	(249)

上篇 《史记》的思想与艺术

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史之有评,由来已久。如果寓褒贬于记事分寸之中也算是一种评论的话,那么,自有史以来就有史评;如以编史者正面使用评论文字才算,那么“太史公曰”是个开端,后代相继承袭,很有发扬光大之势。研究《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了解司马迁对我国史论发展的贡献,批判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繁荣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都是有益的。

一、“太史公曰”的产生和发展

“史学之父”司马迁是个不仅善于师法前人,而且富于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伟大学者。《史记》无论在体裁设置、内容选择,还是人物描写、语言运用上,都无不体现着司马迁的继承与独创精神。《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作为司马迁用以发抒己见的史评形式,也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先秦古籍中的“君子曰”形式启迪下化出来的。

“君子曰”是先秦史家对人物和事件的论断。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古籍中,都有“君子曰”这种论断。司马迁博闻强记,《六经》异传、百家杂说、各种史记等典籍和政府所藏的历代文书档案,都无不通习知晓,对于《左传》、《国语》之类的历史名著